

西 藏 方 志 说

西藏自治区的志书，历代纂修不多，迄今所见者，不过十数种，而以“志”名之者，又不过二、三矣。

“西藏”二字之由来，盖始于清圣祖康熙年间。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圣祖仁皇帝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中，便有“一矢不发，早定西藏”句。清乾隆初期江西峡江县人肖腾麟所撰《西藏闻见录》一书中，开篇便述及此事，其称：“考西藏之载于方輿，即周之西域，汉之西羌，唐之吐蕃也。我朝始分其地为三部，曰‘康’、曰‘卫’、曰‘藏’。而人因其名之实繁，遂总其名而称之曰‘西藏’。”（“事迹”篇）

有关西藏诸事，清雍正以前（1735年以前），或仅见于各种史籍中记载，或仅为出入于藏地者随手记录之“日记”、“纪略”、“纪程”……等，而未见有专门的志书。作为西藏之通志出现者，首推乾隆《西藏志》。书不分卷，纂修者尚无定考。今各家著录多云：“传为果亲王撰”。此乃依据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关中承宣使者和宁（尝官四川布政使，驻藏大臣等）刻《西藏志》的序文中所言，其序称：“况乎西藏为生佛之地，兴教之方。其山川疆域，风俗程途，尤不可不详其记载也。是书传为果亲王所撰，戊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得自成都抄本，爰付剞劂。”可见当时和宁亦未曾考出此书的真正纂修者，仅能用“传为”

二字以代之。

今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吴丰培先生认为，此志并非果亲王所撰。因为“事迹篇记允礼至泰宁送达赖喇嘛入藏事均提行以示尊崇，且称王不名，更无著者自述语气，自非果亲王所撰。”此其一。又“果亲王……乾隆三年薨”“事迹篇有乾隆”元年章嘉呼图克图（即活佛）自藏入都及“寺庙篇载第四世班禅喇嘛于乾隆六年坐床之事。而《使藏日记》允礼于雍正十三年闰四月朔回京，则乾隆元年之事不相关……由此可证，是书决非允礼所撰。”此其二也。（见1978年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印的油印本“中国民族资料史地丛刊”之三）。

〔按：果亲王允礼，圣祖第十七子。雍正元年（1723年）封果郡王，六年（1728年）进为亲王，十二年（1734年）命赴泰宁（即打箭炉——今康定县西北之泰宁寺），送达赖喇嘛还藏。循途巡阅诸省驻防及绿营兵，为时约六月。沿途所见记为《使藏日记》二卷（见《清史稿》卷220）〕。

斯志究竟出于谁手，尚待进一步考证。或为当年跟随果亲王使藏者（果亲王实际上仅到达泰宁寺便返回，并未进入西藏。护送达赖喇嘛进藏至拉萨者，乃为副都统福寿，兵部郎中祁山，理藩院郎中拉布坦，四川督标中军副将张圣学等人），据果亲王《使藏日记》，以及此前记述西藏诸事之书如清康熙末期焦应旗撰的《藏程纪略》，吴廷伟撰的《定藏纪程》，杜昌丁撰的《藏行纪程》，稍后一些，即雍正至乾隆初期王我师撰的《藏炉总记》、《藏炉述异记》……毛振翎撰的《西征记》，王世睿撰的《进藏纪程》，张海撰的《西藏记述》……等等，并雍正《四川通志·西城》及其唐、宋、元、明各代史书所载资料编纂而成，而托名果亲王撰，

亦属可能。

在二百年前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能综合诸家所记，对整个西藏地区作详细的记述，已属难得。且为首创西藏之通志，不能不说它是我国一部宝贵的史地典籍。

其“事迹”篇中，对西藏的古往今来记述较为详尽。开始便称：“西藏一隅，诸鉴多未详载。考其地即西吐蕃也。唐曰‘乌斯国’，明曰‘乌斯藏’，今日‘图伯特’，又曰‘唐古忒’……土人分为三部，曰‘康’、曰‘卫’曰‘藏’。‘康’者即今察木多一路（今昌都地区以东之金沙江两岸），‘卫’者即西藏拉萨台一带（今拉萨市和那曲、山南地区），‘藏’者乃后藏札什隆布一带（今自日喀则以西的整个藏西北高原地区）。”

对于西藏之地理环境，撰者备加赞赏：“居在万峰之中，为西方极胜之区。环山拱合，百泉汇流。自墨竹工卡而下，统召之南西泻，颇得天地之灵脉。布达拉之飞阁层楼，丽色夺目。别蚌、色拉、甘丹、桑鸢四大寺，拱朝于四方。”

“天时”篇称：“平壤则热，高平则冷，有‘十里不同天’之语。”

“物产”篇中，对西藏一地之粮食、蔬菜、牲畜、花果、服物等无不详加记载。甚至连本地原产，外地传入之品种，皆一一考出。

“外蕃”篇称：“西藏定自康熙五十九年……”。

这在“事迹”、“碑文”两篇中均有记载。

“碑文”篇称：“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明毅宗崇祯十五年（1642年）〕，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固始罕谓东土有圣人出，特遣使自人迹不到之区，经仇敌之国，越数年始达

盛京（今沈阳市）。至今八十载，同行善事……后达赖喇嘛之歿也，弟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于藏灭之，复兴黄教……中间策旺阿拉布坦妄生事端，动准噶尔之众，肆行奸诈，灭坏达赖喇嘛，并废第五辈达赖喇嘛之塔。辱蔑班禅，毁坏寺庙，杀戮喇嘛……朕以其所为非法，爰命皇子为大将军，又遣朕子孙等调拨满州蒙古绿旗兵各数万，历烟瘴之地，士马安然而至。”

“事迹”篇亦称：“圣祖仁皇帝……爰命皇子允禔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六师，驻节西宁，调饷征兵……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夏四月护送达赖喇嘛自西宁出口进征……秋九月大兵会于藏……月之十五日，送达赖喇嘛坐床。”

另记果亲王至泰宁事云：“雍正十三年（1735年），准噶尔遣使求成，蒙世宗宪皇帝轸念生灵疾劳，允其所请，定界息兵。又以达赖喇嘛久离藏地，令其回召，以遂其性。特命果亲王至泰宁赐以筵宴”。派副都统福寿等人，“领驻防泰宁官兵五百名，于夏四月护送达赖喇嘛同章嘉呼图克图惠远起程，七月望二日抵召，越七日护送达赖喇嘛至布达拉坐床。”

此志书流传至今，题清乾隆五十七年和宁刻本者，仅见湖南省图书馆和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等二、三家。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一部清徐桐活字印本。其余有三、五家收藏清抄本。惟未见清乾隆五十三年和宁得自成都的那一部抄本流落何处。〔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马俊良曾将此志辑入《龙威秘书》之中，作《西藏记》二卷，清口口撰。〕

与此《西藏志》有关联者，为《卫藏通志》一书。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一部清抄本，不分卷，亦不著纂修者姓

名。已故李盛铎先生有一跋称：“此当是官撰未成之书，所分六门二十五目，按之亦不尽合，第纂辑较他书为详……”。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袁昶在“刻卫藏通志后序”末称：“校刻此《卫藏通志》二十卷”，并附一按语云：“此书系请前户部主事桂林龙松岑先生继拣校刻，伊未署名，详见先公文集中附记。并云原本未著姓氏，疑即为和琳所辑云。”（和琳，蒙古镶黄旗人，清乾隆末期由兵部侍郎出任驻藏大臣，暨升四川总督，工部尚书。）逾年，袁氏“渐西村舍”照写本刻毕印行时，则标为十六卷首一卷。

在“提要”第二条中称：“旧藏志戊申年得自成都抄本，所载程途、风土、山川颇详，随笔采择，另择分门以记。”这个“戊申”，即与和宁刻《西藏志》序文中所称：“戊申得自成都抄本”的“戊申”（乾隆五十三年）相同。由此可知，此《卫藏通志》中的资料，有很多是采自乾隆《西藏志》。

《卫藏图识》四卷末一卷。马揭、盛绳祖纂修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乃是为了乾隆末期进征西藏，平定噶尔喀（今尼泊尔国）叛乱之军旅所需而纂修的。本书“例言”中便称：“是书所集，只取记载详明，俾从军者便于检阅。”又“是书辑自辛亥（乾隆五十六年）暮冬，匝月付梓”。

书首附有四川酉阳直隶州知州鲁华祝〔江西新城县（今黎川县）进士〕撰的一篇序，中称：“……马君以自打箭炉至唐古忒一隅向无刻本成书，爰同梅溪盛君采《四川通志》中‘西域’一卷及无名氏《西域纪事》、《西藏志》等书，删

其繁者，聚其散者，整齐其错杂者，大旨则折衷于《大清会典》。”可见纂修此《卫藏图识》时，亦把乾隆《西藏志》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

此书乾隆原刻本已稀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有一部。而迄今流传较多者，则为清光绪九年（1883年）盛绳祖的后人翻刻的本子。

清乾隆初期，另有肖腾麟氏所撰的《西藏闻见录》一书较有代表性。

肖腾麟，字十州，江西峡江县人，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武举人，五十七年（1718年）武进士。曾任四川北镇（驻今阆中县）左、中、右游击等职，诰受中宪大夫，晋怀远将军。尝领兵驻镇察木多（今昌都县）五年。是书即为肖氏驻察木多时所记、所撰。

书首肖氏自序称：“乾隆二年（1737年），统领官兵驻镇察木多，督理西藏台站也。瓜期当代，时准噶尔奏准进藏熬茶，又以熟悉夷情，留驻二年，盖五载于兹。跋涉所经，风物非一……余驰周旋，凡目之所睹，耳之所闻，躬之践履者，辄笔之于纸，以志不忘。

书分上、下二卷，共二十门。

其中“方语”一门，是迄今所见最早记载汉、藏语音、词汇的一种书。

书末有其子肖锡珀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刊刻是书时撰写的跋文，述及其父撰著此书的经过以及自己刻书之事宜。另附有一篇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代名人卢文绍撰写的“书后”。

此书原刻印本迄今亦属稀见了。

清代后期纂修的西藏志书，以及有关西藏之著述，尚有松筠撰的《西招图略》，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徐瀛撰，《西征日记》，赵咸中撰的《使廓纪略》，许光世，蔡的晋成纂辑的《西藏新志》，以及日本人大田保一郎纂辑的《西藏》，日本陆军步兵大尉山县初男编纂的《西藏通览》……等书。其中以嘉庆《四川通志·西城志》和《西藏通览》两种最俱特色，最有代表性。前者刊列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为官修之书，记述比较全面，内容极为丰富。后者纂成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乃是依据此前各种山县初男所能搜集到的有关西藏之史地典籍辑录、编纂而成，分门颇细，条理清楚，且辑入了清代末期英、俄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之史实，以及清代后期进入西藏“探险”之外国人的情况。此二种书迄今流传较多。

到了民国年间，开局纂修《四川通志》时，曾聘请成都人陈观浔纂修《西藏通志》，此为旧方志中纂修得较好的一种西藏通志，类目清析，考证多有见地。书不分卷，共有三十个门类。

然而此通志成书后未能刊行，仅有一部眷清稿本收藏于四川省图书馆。

清德宗光绪以前（1908年以前），未曾正式纂修过西藏各地的县志（因为此前西藏境内并未设置州、厅、县，仅于各地设粮台或粮站，派员管理粮务等事）。仅在清宣宗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李梦皋纂修过《拉萨厅志》二卷，记述甚略。另外，便是清末民初河北人刘赞廷编纂的原属西康地区各县的“图志”。西藏各地设置县治，乃在清宣统二年至民国元年间（1910年——1912年）。“图志”共有

三十七种，其中二十一种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十六种今属西藏自治区，计为太昭县（今工布江达县）、九族县（今巴青、比如、索县、丁青等县地区）、嘉黎县、昌都县、贡县（今贡觉县）武成县（今并入贡觉县）、察隅县、麦科县（今并入察隅县）、硕督县（今并入洛隆县）、波密县、冬九县（今并入波密县）、同普县（今江达县）、宁静县（今芒康县）、盐井县（今并入芒康县）、定青县（今类乌齐县和丁青县的部分地区）、恩达县（今并入类乌齐县）等。这些“图志”，各县分类不等，有的分十二门，有的分十六门、有的分二十一门。

通志类各种典籍

有关西藏自治区的史地事略，明代以前，仅见于各种史书，如《旧唐书·吐蕃传》、《宋史·吐蕃传》、《明史·西域乌斯藏本传》……等等。其所记又多为史事，而于地理沿革、山川疆域、城池关津、田赋户口、货贝物产等……，所记甚少。明代中、后期纂修的几种《四川总志》中未见有记载。清康熙《四川总志》中也仅于卷三十五“筹边”中云：

“西番即吐番也，其先本羌属，凡百余种，散处河、湟、江、岷间，其酋发、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后有樊兄者，西济河逾，积石居岐布川或逻婆川。隋开皇中，有论赞索者居牂柯西。唐贞观中始通中国。既而灭吐谷浑，尽有其地。”

而以地方志之体例和内容问世者，最早是于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纂修，越二年成书，而于乾隆元年（1736年）刊刻印行的雍正《四川通志》之中的“西域”一卷。距今二百四十六年了。

其“西域”一卷，为该通志的第二十卷。中称：“我国家声教洋溢，遐迩无遗，如大渡以西，万有余里，咸稽颡输诚，岁时入贡，于以见圣朝一道同风之治，为千古莫及。兹列其山川，纪其风土人物，以备职方……”。

所记自打箭炉起（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传为三国时蜀相诸葛亮南征时，遣将郭达安炉造箭于兹，遂得此

名。而《辞海》1979年版第1518页称，实乃为“达折渚”之音讹也。即达、折二水汇流处），一路向西记去，经里塘（今理塘县）、巴塘（今巴塘县）、乍丫（今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木多（又作察木多，即今昌都县）、类伍齐（今类乌齐县）、洛隆宗（今洛隆县。宗：这里为藏语，意即寨落或城堡，相当于县级行政区划）、硕般多（洛隆县西，1960年并入洛隆县）、达隆宗（一作宾巴，今边坝县）、拉里（一名喇里，今嘉黎县）、工布江达（今拉萨市工布江达县）等地，一直记到“西藏”（即今拉萨市及其周围地区）。每一地皆各自标目，计为：疆域 津梁 塘铺 山川 古迹 公署 祠庙 寺观 职官 风俗 物产等。惟所记比较简略，仅俱“方志”之雏型。

于“西藏”一地，本书所记云：“在工布江达之西，为图伯特，又称为康、卫、藏。康即今×木多（泛指今昌都地区以及金沙江东岸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区），卫即今之西藏（指今拉萨市及那曲、山南地区），藏即今之后藏扎什隆布（指今日喀则地区及阿里地区）。”又云：“番民呼为拉撒（即拉萨），乃部民所居之地。”

接着便纪述清代初期平定西藏事略。自清初“颁给达赖喇嘛册宝拉藏干方印一颗”；后准噶尔泽旺阿拉布坦反叛，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九月派各路大兵进剿，平定西藏，送达赖喇嘛上布达拉山（即布达拉宫）大殿坐床（喇嘛教活佛继承仪式称为“坐床”）；雍正二年（1724年）铸立清圣祖“御制平定西藏碑记”；最末记至雍正九年（1731年）封颇罗鼐为贝勒〔颇罗鼐，生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卒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西藏贵族，以平定阿尔（拉）布

坦等叛乱，既后整顿藏政，训练藏军，维护统一，安定藏局等有功，于乾隆四年（1739年）由贝勒进封为郡王。

然后便又依次分疆域、形势、关隘……等门类，逐一纪述。其“形势”门记云：“山高水秀，宛如福地洞天”。“物产”一门，仅记其名称，矿物、植物、动物合在一起，未分别各标小題。于“天异”一门中有云：“日月明晦，雷电震作，较中华无异。少晴霁，多阴雨，夜亦有露，秋终有薄霜。”而“土则”门又记云：乌斯藏田有水旱，土地平衍。活佛及藏王所都。活佛之床处为布达拉，藏王所居为诏。南北袤长四十里，东西延广四、五百里。陆可驰马，中贯河道。水流东南，不甚快急。清波涟漪，澄沏见底。”

对于二百五十年前的拉萨城概貌，本书有记称：“诏内夹河两聚部落，临白水江（即今拉萨河），为藏地之中央，番夷僧俗，商贾杂处，其地广二里许。诏中楼殿衙署，街道马市，井井可观。四围无城廓，就居人所住，碉楼环绕，相联以为藩篱，似中华（指内地）之一大村镇。其余村庄，星罗棋布。外则崇山围绕，隘口险峻，诚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另于“人事”门中记云：“农遇春和水至，耕耘锄耨。水田旱地，各乘时力作……工匠各色皆备，木石工玲珑细腻，丹青累丝尤属奇巧”等。

再后，则附记“自成都府至西藏路程”，分为七个大站，各站皆标出里程。第一站由成都至打箭炉，共一千另二十里。第二站由打箭炉至里塘，共六百另五里。第三站由里塘至巴塘，共三百四十里。第四站由巴塘到瞻对（今新龙县地），共四百二十里。第五站由瞻对至×木多，共四百四十

里。第六站由×木多至喇里（今嘉黎县）共一千二百三十里。第七站由嗽里至嗽撒（即拉萨），共五百三十里。总计四千五百八十五里，（约有五千里）。各大站之间的每小站，亦均列出站名及里程。

最后则为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抚远大将军军允禩的奏章，以及定西将军噶尔弼“平定西藏碑记”、“平定西藏疏”等。

就其体例来说，前已提及，只初具“方志”之雏型，就其内容来说，过于简略，尚不完善。但它比之单独以西藏地方志面貌问世之《西藏志》要早五十一年。《西藏志》在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宁为之刊刻印行前，也仅仅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在成都得见手抄本。其成书当在乾隆中后期，比此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要晚十数年乃至数十年。

下面便介绍乾隆《西藏志》。

和宁，蒙古镶黄旗人，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五十三年（1788年）任四川按察使，五十五年（1790年）升四川布政使，五十九年（1794年）尝以内阁学士侍郎驻藏任事。自著有《西藏赋》一卷。

和宁在其刻《西藏志》的序文中称：“今考西藏志，名其地曰‘拉萨’，其台吉有‘颇罗鼎’者，则知古籍所载曰‘逻娑’，曰‘逻些’（些音婆），曰‘拉萨’，乃译音之近似。曰‘波罗奈斯’，曰‘波罗祭斯’，曰‘颇罗鼎’，又字画之舛讹。总之皆西方佛地也。”又云：“……迨汉明帝夜梦金人，乃发使天竺写致梵经及释迦像，白马驮至中夏，以为寺名……至其方物事迹，徵特汉之张騫、甘英遍阅西土，未有成书。即唐之元玄奘法师，游西域十七年，撰记十二卷，率多省略。或亦考古者之遗憾欤！唯我朝

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斑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固始汗遣使达盛京（今沈阳市）通贡表，岁以为常。此后内臣驻扎其地，镇抚部落，护持黄教……况乎西藏为生佛之地，兴教之方，其山川疆域，风俗程途，尤不可不详其记载也。”

所言各类，倒是有人记载下来了，而其书究竟出自谁人之手，迄今无有确切的证据可考，尚无定论。当时和宁也仅能以“传为果亲王所撰”（前已在“西藏方志说”一篇中述及）而托言之。

考此书之内容及其纂修体例，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所载不同，自非出于同一人之手。此《西藏志》中，除了最后“台站”、“粮台”及“自四川成都抵藏程途”等“程站”外，宁静山以东（即金沙江东岸）各地皆不载，而仅记现在西藏自治区境内之事，不象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一卷那样，从打箭炉记起，一路西去。即是说，此《西藏志》的体例和内容，与其它省的“通志”相近似，虽未分卷，而书中三十三个门类则分得较详细，各门类记事也比雍正《四川通志·西域》所记为详、更趋完善。

“事迹”篇中，把整个西藏的历史、地域作了概述。其称：“考其地即西吐蕃也，唐曰‘乌斯国’，明曰‘乌斯藏’，今曰‘图伯特’，又曰‘唐古特’。居在万峰之中，为西方极胜之区……东与川、滇联界，西与青海接壤（实为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北）直抵河、湟，通西洋达噶斯。”

于西藏的四时气候、土壤等则云：“时岁稍寒，物产无几。地多泉水，土人以为‘海眼’。春则冻醒，夏秋阴雨觉盛。”

对于西藏的历史，又称：“自唐孝德皇帝（即唐太宗）以公主下嫁蕃王和亲王之后，始与中国通往来。”“唐公主好善，修大、小二召，并筑城于布达拉为宫室。”“相传云，昔唐三藏取经，曾履此地，今大召之前廓，尚绘有师徒四众之像。”

对于拉萨市的记述，有云：“西藏大召之地，呼为‘拉萨’。拉萨者，华言佛地也。旧有城廓，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定西将军护国公策旺诺尔布毁之，改筑西南石堤。自东北郎路山脚起，至布达拉对面小山招拉笔洞止，长约三十里，以遏藏江之水势，今呼为‘神堤’”。这段文字，是其它清代前期各种有关西藏的志书中所不见记载者。由此而知，在清代初期以前，拉萨城确实筑有城廓。

然后自唐代一直述及清代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前后—1736年），即从藏王苏隆藏干布（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起，西藏便与内地息息相通。清以前所记较略，自清“世祖章皇帝敕金册印，封为臣”之后，记述就比较详细了。

关于二百五十年前西藏之疆界，在“疆圉”一篇中记述颇详，其称：“雍正三年（1725年），松潘镇总兵官周瑛〔字奇育，号和庵，四川松潘卫（今松潘县）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举人，历任漳腊营（今松潘县北四十里）游击，化林协（四川汉源县西北大渡河东飞越岭下）副将。雍正元年（1723年）升松潘镇总兵，三年（1725年），升任四川提督。曾三襄藏务，均立大功。〕勘定疆址，始定于南墩宁静山岭上为界，并建分界碑，岭东之巴塘、理塘属四川，岭西属西藏，其中叫察卡中甸，属云南，三处疆界始分。”“其地疆址，广阔无垠，不能悉载。”“西南接布鲁克

巴巴勒（今不丹、尼泊尔、孟加拉等国）通西洋等处”，“东北直接西宁界（今青海省）”，“正西至阿里纳达克交界（今阿里地区噶尔、札达等县西交克什米尔界）。”

“山川”篇中，分东、南、西、北逐一记述全藏境内各大小山川。

“寺庙”篇记述较详，从拉萨之大、小二召起，到昌都之江巴林寺，共十七处。末了则称：“西藏寺庙，不可胜计，仅摘其著名最达者而录如右。计康、卫、藏三处，上册有名之寺三千余所，支粮之喇嘛八万四千余众。其它不甚著名之寺庙，喇嘛尤多。

各寺所记，又详略不等，于大、小二召，垂仲殿、布达拉、别蚌、色拉、江巴林等记述较详。述及“大召”时称：

“建自唐时，坐东向西，楼高四层，上有金殿五座。阑干殿宇，皆系铜底溜金，宏敞壮丽，焕然夺目。宝珍奇玩，毕聚于内。中殿供大佛名觉释伽摩尼，云自中土侍随唐公主至藏，年甫一十二岁，成圣西域，或云自中国（指内地）铸请来者。左廊有唐公主暨土蕃赞普（即藏王松赞干布）并白布国王女（松赞干布之妾。白布国在今尼泊尔国境内）型像祀之。”“殿门外前廊壁上绘有唐三藏师徒四众像。”

小召“楼高三层，上有金殿一座。寺乃唐公主所建，坐西，因唐公主悲思帝乡，故东向其门。殿内之佛像名曰珠多吉，云系觉释伽摩尼之弟，甫八岁成佛。又云塑像内即唐公主肉身，俗传如此。”

“布达拉乃平地起一石山，高约二里许，就其山势叠砌成。楼高一十三层，上有金殿三座，亦唐公主所建之官室。”

“天时”篇称：“藏地高下不一，寒暑各异，平壤则热，高平则冷，有‘十里不同天’之语。晴雨靡常，风霾无定。就拉萨而论，其地冬虽寒而不凜冽；夏虽暑而不薰蒸。”“清明立夏之间，草木萌芽，季春夏初之际，麦豆播种。收获则在七、八月之交。”

“物产”篇中，先述本地原产者，再及外地引进者。如“拉萨谷属产青稞、小麦、胡豆、豌豆、菜子。自他处贩来者，则绿豆、黄豆、冰豆、稻米、黑糖。蔬属则园根葱、蒜、芜（芜）荑。近汉人自中国（指内地）带菜种有白菜、蒿苳、菠菜、苋菜、韭菜、萝卜、桐蒿、四季豆……”。

“牲畜”类中有云：“猪颇小，至大不过四、五十斤。鸡亦小。”

“花果则芍药、牡丹、西天花、剪碎绒、蜀葵、金盏粟、虞美人、小丹（有红、白二色）、紫金莲、藏菊花（有红、黄二色）、马兰、松、柏……自他处来者，则葡萄、枣、杏”。

其余诸门类，皆有详略不同程度之记述。

“碑文”篇仅有“圣祖仁皇帝（即康熙帝玄烨）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主要记述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平定西藏事略。碑文撰于康熙六十年，立碑在雍正二年（1724年）。

“唐碑”篇所记，乃唐太宗与藏王松赞干布结盟之事，其称：“大唐文武考德皇帝、大蕃圣神赞普，甥舅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附录”中补记后藏各地事有云：“西藏相传汉张骞曾至其地，唐以公主下嫁赞普，始通中国。距京师万三千余里。”

此志书乃为迄今所见最早的一种西藏通志。它较为全面地记述了西藏之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等。也是首次以“志”为书名的西藏史地典籍。其间资料，为后来各种西藏志书及其有关西藏之著述多所引用。

和宁刻书序称：“戊申〔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得自成都抄本”，而书中所记最晚至乾隆六年（1741年）。是故，成书当距此不远，也即是说，此《西藏志》之纂修，当在清乾隆中期，距今已有二百又数十年历史了。无论是乾隆五十七年的刻本，还是清抄本，流传至今，已不可多得，国内仅见数部，而抄本的年代各异。整个西南地区，仅有一部清抄本收藏于四川省图书馆，且纪事已续增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七世达赖喇嘛传世事。

就全书内容之记述来看，纂修此《西藏志》，一九六八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中，误订为清康熙刊本，且题清、焦应旗著。当是依据各种第一手资料编纂而成。

下面择其有代表性的几种介绍之。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陕西泾阳县知县焦应旗（贵川清镇县举人）撰的《藏程纪略》不分卷；广西全州（今全州县）知州吴廷伟（安徽休宁县人）撰的《定藏纪程》不分卷。此二书皆记康熙末期平定西藏策旺阿拉布坦叛乱时由青海西宁进军西藏沿途之见闻。

焦应旗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便奉檄从军。转运粮草。五十九年（1720年）四月随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允禔，平逆将军延信等从西宁出兵，进征西藏。逾年，经拉萨、昌都、打箭炉至成都而还治陕西泾阳，沿途所见所闻，记为是书。